

# 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

• 鍾延麟

中共軍方在「文革」期間勢力的急劇膨脹和所擔負維持秩序的重要角色，已為各方所詳知與注意，相形之下，其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躍進運動中的角色，卻鮮受到關注，以致造成無足輕重的印象和觀感。就現有大躍進相關研究成果而言，原焦點多集中在上層的發動與「宮廷政治」的運作，其後地方運動發展之研究漸已增多，針對個別部門、領域的探討也逐步出現。然而，有關中共軍方對此一運動之參與和活動的研究，迄今卻仍屬空白。

對於大躍進運動中的中共軍方活動的探討，是還原、重建大躍進運動主要面貌和深化大躍進研究的一項必要工作與嘗試。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運動之參與程度為何？甚麼因素驅動其反應、作為？軍隊有何具體的活動內容和躍進計劃？以及其牽動的政治效應又有哪些？這些皆是本文欲試圖回答的問題。

本文認為：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既不能置若罔聞，也不會袖手旁觀。相反地，對於這場「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運動，中共軍方既熱烈聲援、不吝支持，軍隊內部也呼應大躍進的脈動，推出多項自身的計劃和活動，藉以顯示軍隊不落人後、亟思進取的殷切。如同地方與其他部門，軍方也遭遇了「頭腦發熱」下所帶來的艱難處境。值得一提的是，中共軍方在運動窒礙難行之時愈益吃重的馳援角色，以及其在克服本身困境上展現的能力、方式以及累積的聲望，皆為中共軍方在1960年代地位的上揚和「文革」時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全面參與，埋下了重要的伏筆。此外，中共軍方對大躍進始末的親歷和體會，亦對其後續的政治傾向產生一定的影響。

就現有大躍進相關研究成果而言，原焦點多集中在上層的發動與「宮廷政治」的運作，其後地方運動發展之研究漸已增多，針對個別部門、領域的探討也逐步出現。然而，有關中共軍方對此一運動之參與和活動的研究，迄今卻仍屬空白。

## 一 影響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之因素與動力

有關影響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參與的原因，以下將分別從兩方面進行探討：一是中共行之久遠的建軍傳統原則；另一是運動期間軍方高層的態度與傾向。

## (一) 建軍傳統：以黨領軍與工作隊任務

按中共黨軍關係的設計，「以黨領軍」、「黨指揮槍」乃是最核心的基石。當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大躍進，軍方表態支持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在大躍進啟動的階段，為推動軍方加入運動，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着力頗多：一方面，強調「黨委要抓軍事」，主張貫徹「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系統和地方黨委對軍隊的雙重領導制度」，藉機加強兩者的關係和聯繫，作為軍隊爾後參加各地建設工作，接受地方黨委領導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對於軍方領導也曉以利害，表明大躍進成否事涉軍方，促之出力、共襄盛舉。另外，將大躍進期間原定糾「左」議程逆轉為「反右傾」的1959年廬山會議，會中毛澤東以「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言語，向彭德懷攤牌<sup>①</sup>，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以「黨指揮槍」的名義逼後者就範、屈服。

在中共建軍傳統中，軍隊被界定為一具有多重性功能的勁旅。在「槍桿子出政權」的革命歷程中，軍隊兼是「戰鬥隊、宣傳隊以及工作隊」。因此，對於以改天換地為職志、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大躍進運動，軍隊無疑也被寄予厚望。1958年5月，在正式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強調：「人民解放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保衛者，又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希望借重軍隊年輕力壯的組成、枕戈待旦的鬥志以及上行下效的紀律，加倍地為席地捲起的建設、生產高潮投入力量。軍隊必須從事經濟生產和扮演其他非軍事性活動的「工作隊」角色，在大躍進中刻意地被凸顯、放大，在此之下，軍方更感匹夫有責、捨我其誰。然而，這也對軍隊在如何安排、分配自身時間和精力上造成難題，亦即增加軍隊在多重任務中顧此失彼、分散失焦的可能性。

軍隊必須從事經濟生產和扮演其他非軍事性活動的「工作隊」角色，在大躍進中刻意地被凸顯、放大，因此，軍方更感匹夫有責、捨我其誰。然而，這也增加軍隊在多重任務中顧此失彼、分散失焦的可能性。

## (二) 軍方高層意向與情勢

大躍進運動前後，中共軍方高層的態度與變動，對於軍方參與大躍進亦產生重大的影響。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升級和1959年廬山會議造成軍方首長的異動，無疑是其中兩起最重要的關鍵事件。

「反教條主義」本是軍隊內部針對先前學習蘇聯經驗中，出現照抄照搬、忽視國情現象的一種檢討和反思。但隨着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決心邁出中國自身的建設道路，進而確定採用大躍進之發展思路和戰略後，相較於地方的宏圖抱負，軍隊的態度則顯得滯後。鑒此，毛澤東責成鄧小平、林彪協同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大躍進躁動的氛圍下，加大軍中「反教條主義」的力度，對軍中主管訓練事宜的高級幹部，如劉伯承、粟裕、蕭克等人加以打擊。

在「反教條主義」中，彭德懷自身正是獲益於大躍進高漲的情勢，對於如火如荼的大躍進，自不可能不思有所回饋，更何況彭本人也逐漸相信、接受該運動實是中國「富國強兵」之捷徑。故動員其麾下數以百萬計的軍隊獻身大躍進，或是彭自認對運動力所能及的付出和努力了<sup>②</sup>。事實上，軍隊對於1958年下半年

響應、支援大躍進的過度熱忱和投入，還曾引發毛澤東「軍隊經常要訓練，否則就不是軍隊了」的批評<sup>③</sup>。

雖然彭德懷「熱中有冷」，阻止在軍隊內部採行更「左」的主張和做法，然實如彭晚年所述，在察覺黨內歷次錯誤路線的危害上，其總是後知後覺<sup>④</sup>，對大躍進亦不例外。俟彭德懷開始對大躍進產生懷疑並持以保留態度，以至彭在廬山會議「中箭下馬」為止，運動已開展年餘。易言之，有別於一般對「彭德懷反『三面紅旗』」的化約看法和簡單形象，在其治軍下，無論是出於主動或被動，中共軍方對大躍進的參與形式、活動內容，在其任期內業已大致成形，後繼者林彪之作為，實多不脫「彭規林隨」。

然而，林彪在軍方後續對運動的參與和活動，仍有火上加油的重要影響。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以捍衛大躍進面目與名義參與倒彭，改由林彪統管的軍隊對於運動的介入程度，自不能次於前任，最起碼要維持先前的投入和熱情<sup>⑤</sup>。在軍中開展「反右傾」，整肅異議之聲，乃是迅速見效的方法，前後計有17,212人被扣上各類政治帽子<sup>⑥</sup>。林對於大躍進逐漸浮現的弊病與後遺症，更只能暫且視若無睹，從而擴大了軍隊在運動後期所承受的問題和壓力。

簡言之，從標榜「以黨領軍」原則和軍隊也需擔任「工作隊」使命的中共建軍傳統，至斯時軍隊前、後領導人受氣勢澎湃的運動氣氛所感染的振奮、急於求成的心理和個人利益計算的動機等因素，皆使得中共軍方和軍隊非但不會在「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大躍進中缺席，傾全軍之力更是其唯一的行為選擇。

斯時軍隊前、後領導人受氣勢澎湃的運動氣氛所感染的振奮、急於求成的心理和個人利益計算的動機等因素，皆使得中共軍方和軍隊非但不會在「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大躍進中缺席，傾全軍之力更是其唯一的行為選擇。

## 二 中共軍方對運動之參與作為與計劃舉措

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的參與和活動，依照其角色和作為的性質，可概分為四類：

### (一) 支援活動：參與建設、協助生產

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最直接的方式莫過於履行其「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角色，亦即加入全國建設的行列和工農生產的隊伍。

在大躍進蓄勢待發前後，中共軍方即開始動員軍官家屬還鄉生產；安排一些軍屬機構集體轉業，並動員復員轉業軍人投入國家建設。俟運動全面啟動後，軍方更是躍躍欲試、奮進向前<sup>⑦</sup>。中共軍方制訂了相關決定和方案，指導軍隊行動。例如：1959年2月18日，《解放軍報》公布總政治部發出的〈軍隊進行農業生產的指示〉，其規定：部隊每年以兩個月的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其中一半時間幫助人民生產和參加國家某些建設工程的修建，另一半時間從事自身的農業生產。總政治部另於1959年1月18日擬定的〈關於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綱要〉，也在3月1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頒布施行。

對於作為大躍進主要標誌的大煉鋼鐵運動，軍方自不會等閒視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要於年內完成1,070萬噸鋼鐵指

標的決定後，9月16日，中央軍委就號召全軍在不影響戰備訓練的情況下，以戰鬥精神積極支援國家鋼鐵生產。事實上，對於大煉鋼鐵的熱情，軍隊不下於其他部門和單位。例如：在1958年，空軍方面出了20萬個勞動日參加鋼鐵基建工程，收集廢鋼鐵約1,500噸；為支援鋼鐵運輸，出動汽車1萬餘輛次，派出運輸機25架；自建煉鋼煉鐵爐253座，煉出鐵760噸、鋼197噸<sup>⑧</sup>。由公安軍改編成的總參謀部警備部，其部機關和下轄各師隊，也都搞起煉鋼爐，「想用小煉鋼爐搞他幾萬噸鋼鐵」<sup>⑨</sup>。部隊領導和行伍對煉鋼鐵的高昂情緒，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軍隊中發熱、過火的情形也終不可免。譬如：旨在培養國防現代化建設人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也曾發生部分系所組織學員外出挖煤的情形，引起院長陳賡的批評<sup>⑩</sup>。後來受彭德懷牽連的總後勤部長洪學智，對於為了煉鋼燃料所需，甚至「連一些軍營裏的松樹都砍了」的做法，甚為不悅<sup>⑪</sup>。

軍隊對大煉鋼鐵的支援，更長期地反映在對各地大型鋼鐵廠生產、貨料運輸以及擴建或新建工程之參與，例如：在1959、60年，上海、包頭、鞍山、重慶、武漢、昆明等地的主要鋼鐵廠，皆可見軍人從中奔波、效力的紀錄和蹤影<sup>⑫</sup>。此外，軍方對水利工程建設、重點建設工程、加工訂貨、輔助生產、支援農業生產、交通工程建設，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若以大躍進的主要三年1958至1960年為計，根據《解放軍報》的資料：1958年全軍共以5,900多萬個義務勞動日參與各地建設和生產；1959年義務勞動日有4,000多萬天；1960年則達到4,600多萬天<sup>⑬</sup>。三年共計1億4,500萬個義務勞動日，平均每年4,800萬天。相較於改革開放後從1979至1998年全軍共投入的4億8,000個勞動日，年均2,400萬天<sup>⑭</sup>，軍隊在大躍進三年對生產、建設的總勞動日數，幾近是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三分之一；年均日更高達兩倍。從相關比較數字看，可得知中共軍方在大躍進中「獻身」國家、社會生產的熱烈和密集度。

## (二) 輔助活動：大辦民兵、整頓公社

### 1、大辦民兵

大辦民兵活動的源起，主要針對1958年中東問題和台海情勢緊張而生，軍隊的角色與任務，乃在於協助民間單位進行組織、訓練和裝備。但如同其他領域的工作出現的「大辦」風潮，軍方參與的民兵建設也有浮誇不實的情形。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民兵問題的決定〉，要求「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並需要「軍事系統大力協助」。次月底，毛澤東提出：為使來犯的帝國主義寸步難行，不但要有強大正規軍，還要大辦民兵師。軍方對之響應、支持，高倡「發揚勞武結合的光榮傳統」。10月7至18日，總參謀部在當時以興辦人民公社聲名大噪的河北省徐水縣，召開全國民兵工作現場會議，提出結合生產、大搞民兵師的要求。1959年，軍方提出軍隊要在地方黨委統一領導下努力進行民兵工作，在整社中幫助整頓民兵組織，並以戰略眼光看待相關工作。

作為大躍進標誌的大煉鋼鐵運動，軍方自不會等閒視之。對於大煉鋼鐵的熱情，軍隊不下於其他部門和單位。由公安軍改編成的總參謀部警備部，其部機關和下轄各師隊，也都搞起煉鋼爐，「想用小煉鋼爐搞他幾萬噸鋼鐵」。

籌辦民兵事宜在1960年初又達到一個高峰。1960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上海會議，林彪在其關於國防問題的報告上，提出建立600個基幹民兵師的口號。這無疑為先前組建民兵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數量和形式的做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同年4月，為推動民兵建設、總結交流經驗，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國民兵代表會議，會後不久，總參動員部匯總全國民兵的數字高達2億4,000萬，其中基幹民兵則有9,000萬<sup>⑩</sup>。不過，以上數字應有灌水之嫌，以致中共中央軍委中分管民兵建設的羅榮桓，本身都不予採信，要求檢覆核實。

然而，大辦民兵的運動，從1960年下半年起步入緩停、整治的階段。一方面，大躍進的弊病對於相關工作的持續造成嚴重的干擾，致使軍民無暇兼顧。總參、總政兩部乃於1960年9月27日發出通知：災區暫停民兵軍事訓練，非災區酌量減少民兵訓練任務；另一方面，民兵工作的重心也從發展、擴增改為鞏固、休整。例如：1961年1月12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整頓和加強民兵工作的指示，對純潔民兵組織隊伍、清查民兵武器、控制民兵使用範圍、整頓人民武裝幹部等提出要求。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民兵工作問題的報告〉，通令全國各地重視民兵組織的整頓和鞏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控制民兵使用範圍」的強調，係針對部分地區因大躍進緣故導致幹群關係緊張、發生搶糧等事端時，竟調用民兵平息的情況而來。

1961年12月11日，為進一步提高民兵組織質量，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民兵工作條例〉。次年6月，在毛澤東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實」（組織、政治、軍事落實）下，對全國民兵組織開展一次全面性的整頓後，方使之較為正常地發展<sup>⑪</sup>。

## 2、整頓公社

作為大躍進主要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軍方自始即對其發展抱以高度的注意，並跟隨中共中央在不同時期對該運動所做的指示，在軍隊內部進行宣傳。例如：1958年8月19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宣傳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sup>⑫</sup>，及時反映中央即將在整個農村推行公社運動的決定。中共中央針對公社急於過渡產生的混亂現象，在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總政治部也在1959年2月6日發出要求部隊深入學習的通知。

軍方對於人民公社的關注，並不止於上令的傳達和外部的觀察，軍隊更直接參與了公社的整頓，希望經由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學習此「偉大新生事物」的意義和增進對農村工作成就的認識。從1958年12月19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參加地方整頓人民公社的指示〉，到1959年5月止，全軍派出76,000多名幹部，駐留時間從一個月到五個月以上不等，分期分批參加了5,000多個公社的整頓和鞏固工作<sup>⑬</sup>。

軍隊協助、扶持人民公社發展，在大躍進步入尾聲時仍持續進行。1960年11月12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省軍區、軍分區當好工作隊的指示〉，要求抽出80%的幹部參加整風整社，並結合整頓民兵組織。隔年2月，要求全軍認真清理退還無償佔用人民公社的土地、魚塘、果木林等。然而，「人民公社優越性」在殘酷的現實下開始動搖、令人生疑。為此，1961年4月4日，總政治部號召全軍學習農村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以期統一部隊思想、堅定對公社的信念。

大辦民兵的運動，從1960年下半年起步入緩停、整治的階段。一方面，大躍進的弊病對於相關工作的持續造成嚴重的干擾，致使軍民無暇兼顧；另一方面，民兵工作的重心也從發展、擴增改為鞏固、休整。

大躍進後，對於農村是否放棄公社制度、改而推行包產到戶的爭議，毛澤東特別要求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軍中組織調查<sup>⑨</sup>。可見軍方在農村問題上的主張和態度傾向，甚為中共高層重視而不敢輕忽。

### (三) 內部活動：技術革新、幹部下連以及文化學習

#### 1、技術革命與訓練事宜

呼應着大躍進的形勢，軍隊的訓練和技術工作，也受到鼓動而欲有所作為。例如：1958年2月，總政治部規劃當年度軍隊訓練中的政治工作時，即強調要打破右傾保守思想、掀起訓練高潮，貫徹群眾路線。然而，在實行內容上，則屬以學習、掌握技術和發明、創新技術為主幹的技術革命運動，最具有代表性也為時最長。

該活動的基本設想在於：若能讓官兵高效地獲得並熟用技術，即可大大助益於軍隊訓練工作的進度；而放手讓部隊群眾興革、創造技術，又是其能否順利推展的必要前提。在「敢想、敢說、敢創造」的激勵下，全軍迅速出現了以「一專多能、一兵多用」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以及旨在改善技術裝備、提出合理化建議和有價值創造發明的技術革新運動。以前者為例，因為「拔白旗、插紅旗」的驅策，「全能坦克手團」、「全能炮手師」、「步兵全能槍手」此起彼落、一一湧現，部隊機關也展開了能文能武的「多面手運動」<sup>⑩</sup>；與此相對地，各部隊紛傳捷報，宣稱縮短時間、超前完成各項既定的訓練期程與計劃<sup>⑪</sup>。這與同時期內中國各地、各陣線敲鑼打鼓，歡慶達成、超過指標的情況，實為異曲同工。1959年1月18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開展一專多能和技術革新運動的指示〉，各軍種、兵種爭先響應，使之再起高潮，各軍區亦競相舉辦類似的活動。

此外，大躍進時軍內先後推行的「反教條主義」與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多對規章制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壞。在此基礎上高唱的技術革新，對於既存的規章制度也不免起到一些負面作用。例如：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國防科技工業，因受運動「熱浪」影響，在研發原子彈上，除提出「大家辦原子能科學」、「全民辦鈾礦」的口號以及提早試爆原子彈的計劃外，在技術革新和革命的號召下，甚至有人堅持提議對蘇聯提供之設計及設備進行創新、改造，其莽撞行徑，竟迫使毛澤東親自出面干預、制止<sup>⑫</sup>。雷同的情況，在軍中更是屢見不鮮。鑒此，在大躍進過後，軍方高層對全軍訓練所做的重要指示之一，即是要求學習貫徹條令、遵守規章制度。

#### 2、幹部下連

1958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軍隊幹部下連當兵的號召。對毛的講話，軍方自然不敢小覷，總政治部在1958年9月20日發出指示，把軍隊各級幹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並與一般士兵進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定為制度<sup>⑬</sup>。

此活動由各軍區領導率先實施，例如：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北京軍區司令員楊成武、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昆明軍區司令

大躍進時軍內先後推行的「反教條主義」與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多對規章制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壞。在此基礎上高唱的技術革新，對於既存的規章制度也不免起到一些負面作用。

員秦基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皆身先表率下連當兵，一時風行草偃、蔚為風潮。截至1958年底，全軍已有包括數百名將軍在內的八萬名幹部下連當兵。該活動由於開風氣之先，突破軍旅層級森嚴的規範，確有改善上下級關係、提振士氣的作用。這種在部隊作息和生活中試以貫徹群眾路線的做法，在大躍進後期，更有助於上級調查研究、洞悉基層情況的實質作用。

### 3、文化學習

「大辦學校」、「大掃文盲」、「全民辦大學」、「全民搞創作」乃是大躍進中異想天開的一面。軍隊受此感染，也推出類似的文化學習活動和計劃。

1958年春、夏之際，軍中漸次開展掃盲工作，「一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業已成為行動上的口號。軍方欲有所作為的企圖，更可見於1959年1月14日總政治部發出之〈關於在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其規定在十年內，使全軍大多數幹部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按本人業務需要，在專業知識方面，達到大專教育水平。希望繼50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進軍後，在全軍掀起另一波學習文化的熱潮。為此，還專門在1959年3月、11月召開兩次全軍文化教育工作會議，研究貫徹此計劃。提升士兵教育的問題，也在1960年初提出<sup>24</sup>。與此相關的是，同年6月，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在全軍中學習拼音字母和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關於開展科學普及教育工作的規定〉，對軍中文化學習活動作出更具體的要求。

在軍中推行文化學習運動的主事者——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在1960年9至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遭林彪批判，宣稱其相關計劃使「政治工作方向發生嚴重的偏差」。譚下台後，相關運動也面臨人去政息的處境。11月2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文化教育工作的幾項規定〉，將原定部隊幹部以十年為期普及中、高教育的規定，改為根據各部隊規劃，分階段進行；將原定要求所有幹部一律學習中學六門課程的做法，改為針對不同專業需要選擇學習；將原定每年400小時教育時間，改為根據不同需要自行擬定，但以不超過200小時為準；將原定文化學校向高等教育過渡的要求，改以中等教育為主；士兵文化教育與科學普及教育，也做出收縮性的調整<sup>25</sup>。軍中的文化躍進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截至1958年底，全軍已有八萬名幹部下連當兵。該活動由於開風氣之先，突破軍旅層級森嚴的規範，確有改善上下級關係、提振士氣的作用。在大躍進後期，更有助於上級調查研究、洞悉基層情況。

#### (四) 救援活動：賑災救急

就所有國家而言，當其遭受緊急事故與危機狀態之時，軍隊從事救援和維持體系運作的重要角色，即會受到重視並被凸顯出來。因為軍隊的高度組織性和動員能力，往往能支持、甚而取代原本的行政系統，協助局面恢復正常、轉危為安。中共軍隊的相關活動能力，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大躍進運動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所造成危難的急切之情和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對於自身應負的職責，也有責無旁貸的認識。例如：1960年10月21日，針對大躍進造成人民困苦和生產低落的問題，陳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即呼籲「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sup>26</sup>。

1960年7月，總政治部特發布〈關於軍隊參加抗旱備荒的指示〉，要求全軍積極響應中央關於抗旱備荒的號召，和全國人民一道，戰勝自然災害，力爭豐

收。9月13日，總政治部後續發出節約糧食和支援救災的指示。於此前後，軍隊在救災扶險上的作為，更是不勝枚舉。例如：1960年2月，蘭州軍區幫助地方政府進行抗旱；3月10日，空軍航空兵空運藥品至豫、滇兩省食物中毒相關縣地；1961年6月，河南省軍區抽調7,000餘人搶修花園口黃河大堤等。與其他時期和在大躍進推展階段軍方採取的類似行動相較，其相關作為在運動後期各地經濟瀕臨破產之際，更有預防災情益形惡化、避免情勢雪上加霜的作用。

此外，針對若干遭受運動「左」禍危害最深的地區，軍方更銜命深入當地，執行接管與善後事宜。例如：出現大量饑饉死亡與幹部虐殺平民而驚動中共高層的河南「信陽事件」，中央指派30,000名解放軍部隊進駐該地，一方面發放糧食、避寒衣物，提供緊急醫療服務；另一方面，配合鄭州市官員開展調查並逕行逮捕違法人員。其停留時間長達三至四個月<sup>27</sup>。

### 三 中共軍方面臨之運動後果與相應對策

#### (一) 運動後果

大躍進無視規律、脫離實際的意圖和行徑，其結果是混亂、倒退以及前所未見的人為饑荒。在運動中將士用命的中共軍方，也面臨諸多棘手的難題和挑戰。囿於資料有限，以下僅就若干突出的問題進行探討。

#### 1、物資供應困難

大躍進在各地造成的大小波動，多會反映到軍中內部，影響官兵士氣。羅榮桓之子羅東進曾表示：「吃皇糧」的學校學員「都經常有吃不飽的感覺」，「對於因『左』傾錯誤而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誤意見很多」。

嚴峻的物資供給問題，乃是運動激情過後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冰冷現實，中共軍方也無從迴避。副食品方面，一度「連十大元帥的豬肉供應都成了問題」，遑論其餘的官兵。糧食方面，享有國家供應待遇的軍隊，為了共體時艱，曾發布文件，規定全軍官兵減少口糧供應。然而，在訓練和勞動之雙重消耗下，部隊中食糧不足，連帶的體力下降、健康惡化問題普遍發生，引起軍方高層的高度重視。例如：1960年末，羅瑞卿向即將上任武漢軍區第三政委的鍾漢華傳達林彪的工作指示：首重解決官兵吃不飽的問題<sup>28</sup>。長江下游亦有類似的情形：1961年2月5日，南京軍區許世友，在對南下進行視察的軍委副主席賀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匯報時，即針對同一問題當面陳情、告急。海軍方面，海軍黨委雖曾向部隊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部隊開展農副業生產，組建農場、增加打漁船，但相關措施僅可部分緩解部隊生活困難，而未能將之根本改善<sup>29</sup>。

#### 2、軍心浮動不安

素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共軍隊，其組成來源主要為農村人口。因此，大躍進在各地、特別是農村所造成的大小波動，多會反映到軍中內部，影響官兵士氣，甚至使之發出出格之音。例如：上海的駐軍中，「有些戰士因為家鄉遭了災，鄉親們餓了飯或者是社隊幹部作風不好而說怪話」<sup>30</sup>。前述軍中口糧不足的問題也在部隊中產生批評時政的怨聲。當時正就讀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

羅榮桓之子羅東進曾表示：「吃皇糧」的學校學員「都經常有吃不飽的感覺」，「對於因『左』傾錯誤而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誤意見很多」<sup>⑳</sup>。

軍心忐忑不穩，問題接踵而來。部隊思想發生混亂，行為舉止也出現一些失序、甚而違法亂紀的現象。以海軍為例：1959年12月1日，舟山外海潛艇、軍艦相撞；1960年1月12日，海軍航空兵駕機叛逃至台灣；同時一些中小責任事故和殺人、外逃事件也屢有發生<sup>㉑</sup>。由於類似事端的層出不窮，軍方還特地頒布關於強化軍容風紀的規定，以防微杜漸。

### 3、其他

大躍進時期中國各地由於建設貪多圖快，產生了許多工傷事故，生產的質量也相對地低劣，軍內亦有同樣的問題。針對前一問題，總政治部曾組織專門會議，研討如何預防事故、保證部隊安全。建設和生產方面，國防工業系統的基本建設與生產產品之質量，也出現普遍下降的窘況。例如：飛機製造廠廠房建築的粗糙，以及因航空產品的不合格導致大批飛機無法出廠等問題。對此，中共中央軍委在1960年5月10日決定：在一切國防工業生產中，應當明確提出質量第一、在確定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口號；堅決反對單純追求數量，只計算產值，不顧質量的錯誤觀點<sup>㉒</sup>。

#### (二) 因應對策

筆者在下面會着重探討軍方對於物資供應困難和軍心浮動不安等問題，所採用的補救措施和解決之道。

#### 1、發展農副業生產、安頓部隊生活問題

「無糧不穩」，中共軍方對此甚為明瞭。1960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上，提出「兵農結合」、「亦兵亦農」的口號，要求「抽出一部分部隊專門搞生產，建立生產基地」。為因應情勢的每下愈況，1961年7月中旬，由總後勤部出面主持「全軍後勤工作座談會」，針對部隊中糧食緊張的狀況，要求全軍抓緊生產節約，組織好農副業生產。同年11月，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召開，提出「大量生產糧食、大搞畜牧業」的方針。此外，總後勤部還提出辦好軍中伙食的要點，直接指導部隊食堂的管理和運作。

軍方總部以外，地方軍區的實踐也取得重要的經驗和成果。以武漢軍區為例，在其政委鍾漢華的主持下，採行對策有：第一、將吃飯問題從「政治問題」中解禁，突破先前不准說吃不飽的政治禁錮，要求在部隊消除水腫病、不准餓病一人。第二、調兵開荒播種、圍湖造田，迅速建立糧食生產基地，同時發展漁、牧、副業，以彌補軍糧供應之不足，並以點帶面、形成規模。第三、對於軍區內從事農副業生產的部隊和單位，制訂出較合理的截留比例和統一的規定標準，杜絕截留過高的情況，亦防止上級的徵調。第四、對於先前各級領導為掌握機動使用，對糧食法定供應標準進行剋扣的做法，一律予以取消<sup>㉓</sup>。相關做法的實施確有助該軍區生活情況的改善。

軍心忐忑不穩，問題接踵而來。部隊思想發生混亂，行為舉止也出現一些失序、甚而違法亂紀的現象。以海軍為例，舟山外海潛艇、軍艦相撞；海軍航空兵駕機叛逃至台灣；同時一些中小責任事故和殺人、外逃事件也屢有發生。

## 2、強化政治思想工作

針對軍隊因大躍進結果不如預期而大失所望的心理，以及由此產生的怨懟、不信任、甚至抵觸的情緒，從政治思想層面着手，澄清思想、鼓舞士氣，並深入基層、加強管教。毛澤東在1961年初重新啟用軍隊政工老手羅榮桓元帥回任總政治部主任，取代因政治思想工作不力而受林彪批評去職的譚政，或基於如是考量。

強調政治工作和在部隊建設中側重連隊發展，向來是中共在各時期建軍的基本原則和特點。前者是後者的指引，後者又是前者的載體，兩者相輔相成。在大躍進推行的過程中，一方面，經由政治教育、宣傳與灌輸，使軍隊認識、熟悉運動進展，並培養其認同與參與感；另一方面，在軍中推行群眾路線，尤其在連隊基層，建立「試驗田」<sup>⑤</sup>、在連隊中開展「五好」運動<sup>⑥</sup>、推動幹部下連隊，以及培養「三八作風」<sup>⑦</sup>，都屬運動發展時期的相應作為。當大躍進惡果一一浮現後，上述實踐的內容也「與時俱進」地做出質的改變。

政治思想工作方面：1960年9至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突出部隊各方面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隨後，更在軍中廣泛推行強調政治思想為優先的「五好戰士」、「四好連隊」運動<sup>⑧</sup>。面對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凋敝、大量饑饉的窘況，1960年12月2日，軍方特地發出〈關於做好駐重災區部隊和家在災區人員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對於官兵不滿的言詞，也強調具體分析，不亂扣帽子。

一方面，在「經濟基礎」上緊抓發展生產、安定生活；另一方面，在「上層建築」中加緊政治思想工作和連隊教育管理<sup>⑨</sup>。兩翼同時推進下，軍隊方能在大躍進造成的困境中「亂雲飛渡仍從容」。

針對軍隊因大躍進結果不如預期而產生的抵觸情緒，毛澤東在1961年初重新啟用軍隊政工老手羅榮桓元帥回任總政治部主任，取代因政治思想工作不力而受林彪批評去職的譚政，或基於如是考量。

## 五 結 論

中共軍方對於大躍進運動的參與甚為積極，活動內容也相應地豐富；軍方在全黨全民「發熱」之時，不甘置身事外，也曾豪氣干雲、急欲成就一番偉大事業。無可諱言，軍方所承受的運動代價亦極其沉重。即便如此，軍隊在此運動前後表現的赤忱、真誠和相關紀錄，也不應就此而遭受埋沒。最後，筆者在文末針對中共軍方參與大躍進所衍生的政治影響和效應，作一簡單、初步的探討，藉以拋磚引玉。

在大躍進尾聲與其後，除了中共黨(政)、軍的互動關係有所發展外，尤值注意的是，軍方地位的攀升和能量的累積。黨國對軍隊方面：一方面，宣傳上，中共中央與軍方高層以齊一口徑、轉嫁禍由的方式，舒緩軍隊與軍人的疑慮、不安，轉而成功地激起其同仇敵愾、保家衛國之心，堅定了共度國難的意志和決心；另一方面，國家在生活上給軍隊的保證，則是持續供給讓之得以維持最低生存、運作之基本所需的穩定。

軍隊對黨國方面：軍隊具備的高度政治性與紀律性，以及以組織見長的效率，使其成為中共在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嚴峻情勢和挑戰時，仰賴倚重的重要力

量。軍隊的持續力(此乃一哄而起的一般群眾運動所欠缺而無能相比的)，實是運動難以為繼時的主要支撐來源。無須贅言的是軍隊的專政性質和鎮壓能力，更是江山不改顏色的最後底線和憑藉。此外，影響爾後政治變化的關鍵發展是，軍中高唱的思想工作、政治統帥和精神作用，以及對運動始作俑者的衷心擁戴和忠誠不渝，既贏得大躍進主其事者的信任與激賞，在一定程度上，更取代了運動醞釀和開展之時曾獨佔鰲頭一時的方面大員，成為證成先前路線正確、偉大的具體樣板和賡續載具，從而預示軍系領導和軍方勢力在60年代前半期愈加顯眼、活躍的機會和趨勢。

中共軍方在各地對大躍進的投入和參與，也為解放軍介入與關心地方事務，扎下隱而不顯的基礎。因為經由運動期間軍隊對各地建設和生產的支援，軍方和地方機關之間協作關係的建立和養成，軍隊透過辦民兵、整公社活動對社會基本組成單位的滲透，以及軍人不計付出、任勞任怨、親民愛民形象的深植和流傳，皆提供了軍隊在日後地方建設甚至地方治理上過問的渠道和發言權力。這種涓滴聚存、潛移默化的發展，對60年代後期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三支兩軍」以及相關管理、維安工作上，間接提供減輕阻力、順利推動的土壤和環境。

向來為一般人所忽視的是：或許也正由於軍隊見證、親歷了「左」傾錯誤在地方所造成的危害，刺激軍方對當地事務的關切與興趣，甚至到了有造成「軍隊向地方開炮」、干涉地方政治之虞，迫而需要軍方高層下令禁止軍隊向地方「亂講」的地步。其相關遺緒雖一時受到限制壓抑而蟄伏，卻可能是促使軍方，特別是長期坐鎮駐守一地的地方軍事領導，在後來政治運動中立場態度多偏於保守的關鍵因素之一。

中共軍方在各地對大躍進的投入和參與，提供了軍隊在日後地方建設甚至地方治理上過問的渠道和發言權力，對60年代後期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三支兩軍」等工作，間接提供順利推動的土壤和環境。

## 註釋

- ①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秘書手記》，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134。
- ② 〈彭德懷同志號召大家：站穩立場、認清時局，做一個亦工亦農亦兵的共產主義戰士〉，《解放軍報》，1958年8月23日，版1。
- ③⑩⑮ 《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鑒，1927-1996》，中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頁1780；1802；1836。
- ④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29。
- ⑤ 林彪：〈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紅旗》，1959年第19期，頁20-21。
- ⑥⑲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29；270。
- ⑦ 蕭華：〈參加國家建設是人民解放軍的光榮任務〉，《紅旗》，1959年第15期，頁12。
- ⑧ 〈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一年來空軍建設成就大〉，《解放軍報》，1959年1月3日，版2。
- ⑨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84-87。
- ⑩ 任學文：〈陳賡與「哈軍工」〉，《湘潮》，2003年第4期，頁7。
- ⑪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676-77。
- ⑫ 例如：湖北省委曾要求湖北軍區，在地方貸給資金的情況下，由該軍區負責建設一座鋼鐵聯合工廠，並規劃該廠在1958到1959年年產鋼、鐵各5萬噸，1962年達

至年產鋼鐵各50至60萬噸。參見〈加快祖國工業化的速度〉，《解放軍報》，1958年6月24日，版1。

⑬ 〈爭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解放軍報》，1959年1月1日，版1；〈我軍去年又以四千多萬個義務勞動日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在祖國連續躍進中連任突擊手〉，《解放軍報》，1960年1月22日，版1；〈全軍支援國家建設成績顯著〉，《解放軍報》，1961年1月28日，版1。

⑭ 林建公：〈人民解放軍和國家經濟建設50年〉，《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24。

⑮⑯ 黃瑤、李志經、楊國慶：《羅帥最後十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96-98；113。

⑰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軍事圖書館等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一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342。

⑱ 〈總政治部號召全軍學習和支持人民公社〉，《解放軍報》，1958年8月22日，版1。

⑲ 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134-35。

⑳ 〈掛政治帥旗、破技術神秘論——第一個全能坦克手團出現〉，《解放軍報》，1958年8月18日，版1；〈第一個全能炮手師出現了〉，《解放軍報》，1958年6月18日，版1；〈步兵全能槍手運動〉，《解放軍報》，1958年8月27日，版2；〈機關開展多面手運動〉，《解放軍報》，1958年8月10日，版2。

㉑ 例如：〈總路線的光輝普遍照耀——駐天山部隊訓練大躍進〉，《解放軍報》，1958年6月12日，版2；〈一個月完成三個月訓練任務〉，《解放軍報》，1958年7月24日，版2。

㉒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46-47。

㉓ 楊成武：〈談幹部當兵〉，《紅旗》，1959年第4期，頁21-25。

㉔ 〈把士兵的文化教育全面抓起來〉，《解放軍報》，1960年2月29日，版1。

㉕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126-27.

㉖⑳ 白之芳、都愛國：《軍法中將：鍾漢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371-72；373-74。

㉗㉘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206；206-207。

㉙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頁355-56。

㉚ 歐陽青：〈擔任軍委副主席後的賀龍〉，《湘潮》，2005年第4期，頁19-20。

㉛ 本活動乃軍方學習中共中央批發之湖北省委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號召幹部以普通士兵姿態到連隊一同工作、生活，發掘和解決問題、總結經驗並加以推廣，站在群眾中領導群眾。

㉜ 1958年5月，總政治部發出開展「五好」運動指示。「五好」乃指：學習好、勞動好、紀律好、節約好、身體好。

㉝ 所謂「三八作風」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此一運動在1960年5月於全軍中推行。

㉞ 「五好戰士」內容為：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鍊身體好。「四好連隊」指連隊工作主要抓四個方面：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1960年末至1961年，全軍開展該運動。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紀，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589。

㉟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頁282。

**鍾延麟**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中共政治史、中國外交。